

古典生态智慧与可持续发展之道

冯天瑜

摘要: 现代工业文明取得巨大进展,同时也带来严重问题,诸如环境污染、人的意义危机等。针对“现代病”,谋求经济增长、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三者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趋势,而中国先哲的“和谐”“中道”观、“绿色意识”、共济式人伦观,可以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某种启示。

关键词: 和谐;中道;绿色意识;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4)05-0001-06

一、“和谐”与“中道”

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史,大略经历了采集渔猎时代、农耕畜牧时代、工业化时代三个阶段,当下正在向信息智能时代转化。前两个阶段,都走过了“创生—繁荣—衰败”的全过程,第三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极盛,其弊端在此先后愈益显现。这三个阶段文明盛极而衰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共通的一条原因便是,该生产方式已日益严重地破坏生态环境,又伴之以社会问题的积淀,人们只得寻求新的生存方式,向新的文明形态过渡。

工业化时代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严重性更成倍张大,而环境问题则日益全球化,现在任何国度、任何民族都无法躲避全球变暖、空气及水质污染的威胁。如果臭氧层继续变薄,大气空洞扩大,那么全人类便会普遍遭受紫外线的杀伤性照射,任何人都难以逃遁。造成全球性生态问题的症结,便在于文明发展的无节制性,也即中国先哲所指出的——“过犹不及”。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降,人类的发展理论出现革命性转折——从对资源、能源的高消耗,对环境的掠夺性开采以求得发展,转变为不仅谋求经济增长,而且注重环境、人口、文化的综合发展;不仅造福当代,而且惠及后代的长远发展,也即顾及到“世代间平等”问题。追求经济增长、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三者协调共进的“可持续发展”,日渐成为世人的共识,但这种共识还有待从哲理层面加深,从实践层面落实。总之,“可持续发展”在知行两方面都处于初始阶段,尚需要朝深度与广度进军。

就“知”的层面而言,先秦哲人的“和谐”观与“中道”观,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丰富而深邃的哲理之源。

“和”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指两种或两种以上事物间的和谐关系,指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和”是形成事物的法则。老子说: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①。

意谓万物背阴而向阳,阴阳两气互相激荡而成新的和谐体。周太史史伯说:

作者简介:冯天瑜,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①《老子》第42章。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①。

认为两种以上不同事物形成多样性统一的和谐关系，确实能产生出新事物来，而相同事物加在一起并不能产生新事物。因而史伯反对“去和而取同”^②。孔子发挥这一思想，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③的著名命题，肯定差异性事物间的和谐关系。荀子则进而把“和”的观念引申到万物生成的高度：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④。

与“和谐”观念相联系的是不走极端的“中道”观念，认为“过”和“不及”两种偏颇皆不可取，提倡“中行”^⑤、“执和”^⑥、“时中”^⑦、“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⑧，将“中和”视作根本法则，遵循此法则，天地万物便获得秩序、顺序长育——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⑨。

“和谐”观念与“中道”观念，是认定人生的最高境界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⑩达到天人间的协调统一。这种理念虽然不是正面论述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但在借喻之间，流露出尊重、顺应自然规律，维持生态平衡的卓越理念。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国语》有“里革断罟匡君”的故事：春秋时鲁宣公在泗水张网捕鱼，其臣里革把“罟”（渔网）割断，扔在水里，并对宣公说，春夏是鸟兽鱼鳖卵怀孕之际，不应捕杀；是树木发芽生长之际，不宜砍伐。而动植物得到繁衍，人类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⑪。

孟子在论证“仁政”、“王道”时，也有类似的“观物比德”之喻——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⑫。

《逸周书》记载着封山育林的思想：

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⑬。

荀子更从哲理高度论述尊重自然规律的必要性：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⑭！

认为人的功能是与天地配合，如果人放弃与天地配合的本分，却去与天地争职责，便是犯糊涂了！《管子》也有类似见解，认为人不能“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否则“天不予时，地不生财。”^⑮

二、“绿色意识”

农耕文明时代留下的思想遗产，具有深远价值的一种，是上遵天道、下循地理的观念。如果说，先秦哲人谈及此点，多半是论证伦理、政治问题的借喻，那么，农学家则是正面探讨这一问题。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指出：

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⑯。

① 《国语·郑语》。

② 《国语·郑语》。

③ 《论语·子语》。

④ 《荀子·天论》。

⑤ 《论语·子路》。

⑥ 《论语·尧曰》。

⑦ 《中庸》。

⑧ 《中庸》。

⑨ 《中庸》。

⑩ 《易·乾·文言》。

⑪ 《国语·鲁语上》。

⑫ 《孟子·梁惠王上》。

⑬ 《逸周书·大聚解》。

⑭ 《荀子·天论》。

⑮ 《管子·形势解》。

⑯ 《齐民要术·种谷第三》。

贾思勰在总结中国传统农业经验时，概括出农畜产业的循环生产模式（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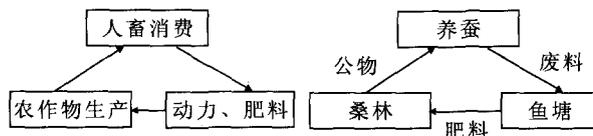


图1 传统农畜产业的循环生产模式

这种“人事”不违天地规律的“因势利导”思想，顺应自然发挥人力的思想，耕作、养殖、消费三者有机循环、生生不已的思想，是中华文化关于“天—人”关系、“人—地”关系的卓识远见。因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高，此类经验概括还是浅层次的，但所包蕴的意义却十分深长，与当下正在觉醒的“绿色意识”、正在兴起的“绿色营销”在理念上相通。“绿色意识”指人类应仿效绿色植物，取之自然，又回报自然，有利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实现经济、环境和生活质量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协调；“绿色营销”指生产者及企业在满足顾客需要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获得利润。

从“绿色意识”中还可引申出“绿色消费”的观念，即适度消费意识。当下发达国家的高消费已经造成资源的巨量损耗；而发达国家高消费的情景通过现代信息手段，生动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导致发展中国家消费观念更新的速度，大大快于科技与经济发展速度，形成一种浮躁、超前的消费取向。值此之际，东方固有的“节俭”意识，“量入为出”的治家治国理念，具有修复性疗效，其精义也正与绿色植物生产（光合作用）与消耗统一，生产量大于消耗量（方有有机物积累）的示范相合。这种天人协调的绿色意识及其表现——绿色营销、绿色经济、绿色消费，指示着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以高效、低耗、少污染以至无污染的生物方法、绿色技术取代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达到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协调互济。

人类对自身和外在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主客浑然一体阶段”、“主客体两分对立阶段”、“主客体辩证统一阶段”。如果说，西方文化较典型地经历了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化，这便是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所完成的任务，现在已步入后工业时代的西方正处在由第二阶段（主客体两分对立）向第三阶段（主客体辩证统一）转化的过程之中。东亚的思维方式未能充分展开主体与客体（或曰人与天）的分离，以中国为例，虽然有春秋时期子产倡言“天道远，人道迩”，战国荀况、唐代刘禹锡论证“天人相分”，但就总体而言，“天人合一”观念占优势，天人相分观念没有获得充分发育。这一倾向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特别艰难曲折互为因果。但中国传统的主体一体、天人合一的理念，对于当下正在形成之中的“主客体辩证统一”思维方式显然富于启迪。这正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东西方哲人注目于东亚智慧的原因所在。

东亚智慧没有也不可能树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资仿效的完备样板，它所提供的只是闪耀着真理之光的某些启示。由于东亚智慧没有完成“主客体浑然一体”向“主客体两分对立”的转化，这本是东亚智慧的一种时代性缺陷，但东亚智慧阐扬的人与自然的一体观——从自然规律经过人的自觉而发展出伦理观以达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统一的观念，如孟子所说“仁民爱物”，主张施仁政于民众，更把爱推及到万物；又如宋代思想家张载的名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①，视万民万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整个宇宙是一个大家庭，这种绿色理念对于纠正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导致的种种弊病，无疑具有精神疗治作用。

东方智慧的另一渊源——印度思想也有此类资源，诗人泰戈尔说：

印度人……把世界和人一起包括在一个伟大的真理里。印度人强调在人和宇宙之间的和谐，……^②

这种思想与中国先秦哲人的“赞天地之化育”、“人与天调”一类理念是相通的，它们对现代人克服主

① 张载：《正蒙·乾称篇》。

② 泰戈尔：《没有墙的文明》。

体与客体截然两分对立造成的生态危机富于启示性。当然,这种“克服”绝不是否定现代文明,重新回复古代的“主客不分”、“主客混沌”,而是充分肯认工业化的成就,利用现代科技的巨大威力,将现代生产力引导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绿色运作轨道上。

现代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开始超越人与自然两分对立观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如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奥尔多·利奥波德所著《沙乡的沉思》一书,描述作者在一个废弃的沙乡农场,运用现代科技恢复生态完整性的探索过程及其思索。该书的一节,名为《土地道德》,首次从道德角度提出人与自然关系标准,把土地看成一个由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组成的共同体,而人只是共同体中的一个普通成员。该节论述维持生物链完整性的重要性,指出人如果过分垦殖、开采,强行打破这种生物链,是不道德的,而且,“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利奥波德还指出:“一个事物,只有在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双向互助式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这种认识与中国一千年前的哲学家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的命题一脉相通,不过这是在新的科技、新的生产力水平上的哲学及伦理学概括,生动展现了人类理智的古今贯穿性和中西相应性。

三、协和共济的人伦观

近20年来,“可持续发展”已逐渐成为世人注意的焦点,但其认识主要集中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上。然而,人类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除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外,还必须追寻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协和共存境界,求得人自身心灵的健全发展。而东亚智慧提供的互动共济的人伦理念在这一领域尤其值得借重。

阴阳彼此依存、相互为用的观念,是中国哲学的精髓,表现在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上,是发扬“仁者爱人”、“交相利,兼相爱”精神,以达成人际间的双向互助式和谐共处。

东亚智慧关于人伦关系的内容十分丰富。东亚的仁爱、兼爱与西方的博爱有着内在的相通性,这里不作详论。东亚智慧的人伦观,尤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肯认尊卑、男女、长幼间双向互敬关系的“五伦”思想。“五伦”又称“五常”,原指宗法社会中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组关系,但又可放大,如君臣关系可泛解为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可包括同事关系。中国传统伦理对这些关系的界定,有单向独断论和双向协调论两种。前者以“三纲”说为代表,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①。认定尊者、长者拥有绝对权威和支配地位,卑者、幼者唯有屈从的义务。这种单向独断论的绝对主义伦理观念构成专制政治的伦理基础,是现代化进程应予扬弃的东西。后者的代表性表述则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②。其间包含着较多的人际间的温情、理解和信任,而且是相对性的、双向性的要求。以君臣一伦而言,“五伦说”便对君与臣两方面都提出要求: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上芥,则臣视君如寇仇^③。

至于夫妇一伦,则以“义”为标准,“夫妇以义事,义绝而离之”^④。“夫不义,则妇不顺矣”^⑤。这里强调的也是一种双向性要求。此外,在父子关系上,主张“父慈子孝”;在兄弟关系上,主张“兄友弟恭”,也是双向要求;朋友关系则讲究互利互助,“交友之旨无他,彼有善长于我,则我效之;我有善长于彼,则我教之。是学即教,教即学,互相资矣”^⑥,倡导朋友间互相取长补短,推崇的仍然是双向互动关系,促成人际间达到和谐境界。

梁启超慧眼卓识地将“五伦”的精义称之为“相人偶”,也即人际间对偶关系的相敬互助。梁启超指出:

① 孔颖达疏引《礼纬·含文嘉》。

② 《孟子·滕文公上》。

③ 《孟子·离娄下》。

④ 司马光:《家范·夫妇》。

⑤ 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

⑥ 王肯堂:《交友》。

五伦全成立于相互对等关系之上，实即“相人偶”的五种方式。故《礼运》从五之偶方之，亦谓之“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人格先从直接交涉者体验起，同情心先从最亲近者发动起，是之谓伦理。^{[1](P75)}

这种对人际间在权利与义务两方面提出双向互助性要求，以形成较为和谐的人伦关系，在利益驱动的现代社会尤其显得宝贵与急需。东亚国家、地区 20 世纪下半叶创造经济奇迹，除利用最新科技成就，借用西方市场经济的竞争与激励机制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东亚伦理的人际和谐精神得到现代式发挥，将企业和社会组合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命运共同体”，使管理者与劳作者在“和”的精神凝聚之下，形成长久、牢固的“合力”，而不是短暂的利用关系。这正是对东亚和合精义的创造性发挥，暗合了孟子的名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①。也暗合了荀子的名论——

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②。

与佛教的“丛林共住精神”也彼此契合——在管理架构上“各守其份，各尽其职”；在生活上，以众靠众，实践互敬互勉、无诤共住的和合僧团精神，共同遵守“六和敬”——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利和同均，见和同解。此皆为可久可大之道。

四、太极图启示

东亚智慧中蕴涵着丰富的关于“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内容，而“和谐”精义最简明、直观的体现便是太极图（阴阳鱼及阴阳鱼与伏羲八卦的合图）。

这一图式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宇宙构成的奥秘：阴阳对立而又统一，相应而又合抱。太极图中的 S 曲线，是一分为二的阴阳双方彼此依存、制约、消长、转化的动态展现。由此曲线判分的阴阳双方，互补共生，相反而又相成，象征着宇宙万象遵循对立统一法则实现的和谐。在阴阳鱼周围绘出伏羲八卦图，合称“伏羲太极图”，展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③ 图像，将易道的“流行”与“对待”两大精义生动揭示出来。太极图形象而集中地体现了东亚智慧的多元综合性、互补和谐性、动态演化性及模糊意向性。这种特性表现于人世间，便是“琴瑟调和”、“政通人和”、“协和万邦”；体现于天人之际，便是人类与自然相亲和，“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④，达到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

阴阳互补共生、相反而又相成的观念，是克服主客两分对立的现代病的启示之源。美国当代物理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 1938—）对此有生动的论说。他批评笛卡儿、牛顿代表的工业文明的机械论潮流，主张从中国关于“道”的观念和阴阳互补思想吸取营养，建立有机的生态智慧。他认为，文化观念中包含阴、阳两种因素，女性、收缩、保守、回应、合作、直觉、综合可归于“阴”；男性、扩张、要求、进攻、竞争、理性、分析可归于“阳”。西方智慧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失衡，主要表现为阳盛阴衰，“过分强调了阳——理性知识、分析、扩张；忽视了阴——直觉知识、综合和生态意识”^{[2](P24)}。西方文化是一种“阳性文化”、“崇阳文化”，并已发展到“至阳”。根据“阳至而阴，阴至而阳”的原则，它正面临“阳至而阴”的转折。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东亚智慧的启迪至关紧要，因为东亚智慧包含着丰富的阴性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体现着阴阳平衡。卡普拉以西医代表西方智慧，以中医代表东亚智慧，比较二者的差异：

在西方医学中，具有最高名望的医生是对身体的某个具体部位有详细知识的专家。而中医理想的医生是哲人。他们懂得所有的宇宙模式是如何在一起共同运行；他们以个体为基础来治疗每一个病人；他们的诊断不是把病人分类为患某种特殊的疾病而是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每一个病人总的精神和身体状态及其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3](P308)}

卡普拉对于东西方智慧的这种概括，大体是确切的，与本文题旨亦有相通之处——疗治现代文明病，

① 《孟子·公孙丑下》。

② 《荀子·王霸》。

③ 《易·系辞上》。

④ 《中庸》。

使现代社会走向健全发展的道路,不能一味依靠西医式的分体疗法,而需要借鉴中医式的辨证综合施治。

古典生态智慧在数千年间,经历了“下学上达”与“上学下移”的双向发展过程,既凝聚在《周易》、《老子》等典籍文本之中,发挥于文化大师的宣讲、阐释之间,同时也活跃于百姓的日用实践里,形成诸如勤俭敬业、信用信实、重教尊师、注重积累等习俗、规范,不仅在历史上发挥过作用,而且在工业东亚的现代化进程中显示巨大的活力。因此,古典生态智慧的未来走向,不仅取决于东西方智慧的相互吸纳融合,而且取决于在现代生活的新高度上,实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健康互动——以精英文化提升大众文化,由大众文化滋养精英文化,这是东亚智慧获得源头活水,生生不息的机制所在;也是精英文化防止枯涩、顿滞,大众文化克服物欲化的沉沦倾向的希望所在。

五、古典生态智慧的历史局限

古典生态智慧作为原始整体思维的产物,对克服现代病颇有启示,但也存在历史局限,不可能提供“疗治现代病”的现成方案和操作手段。以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论,古典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观念,对于现代人克服人与自然的二分对立,富于启迪,然而,“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原义是讲人处天地间的超越态度,并非正面探讨人如何在操作层面上实现与自然的和谐,故在流行此说的古代中国,未能从实践上解决发展生产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问题。实际情况是,随着人口增长、土地过度垦殖,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在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阶段恶化程度渐增,加之专制帝王的穷奢极欲,唐人杜牧《阿房宫赋》所云“阿房出,蜀山兀”一类现象层出不穷。先秦时森林茂密、野鹿成群的三晋、河洛一带,唐宋以降变得黄土秃兀、沟壑纵横;河西走廊的绿洲沃壤被漫漫黄沙所淹没;曾经古木森森的鄂西北山地,至明清因移民开垦,变成一片童山。这都提示我们:不能把产生“天人合一”理念的农耕文明美化为“桃花源”式的黄金时代。那时的人类由于工具理性的滞后和认识上的短视,不可能克服对大自然的盲目性,在愚昧和贫困的逼迫下,生态破坏日趋严重。故“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理想,只有经历现代文明的洗礼,又获得现代科技伟力的武装,方能为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道提供切实的借鉴。

就人与人、人与社会层面而言,古典生态智慧重视人伦,形成一种对人生目标的公正概念、宽容和深思的精神和平,具有很高的德性价值。然而,东亚智慧并未寻觅到普遍维护民众人格独立、社会公正的制度保障,社会长期运作的是“轻视人,使其不成其为人”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三纲”束缚下,广大民众的自由被剥夺,一些起码的生存权利被禁绝。“尊尊”、“亲亲”的宗法积习又妨碍法制的推行,“官本位”、“任人唯亲”更成为沿袭至今的痼疾。这些问题的克服,当然有赖东亚智慧内部健康因素(如“民唯邦本”、“法不阿贵”等观念)的张扬,但尤其需要现代文明的强劲冲击,其间西方的人文精神、自由理念、民主与法治相整合的思想,是必不可少的参照。就伦理而言,东方智慧主张发扬道德义务及社会责任心,与西方智慧强调个人权利、公平竞争原则,应当互补共存。

总之,那种无视古典生态智慧的认识当然有害,而以为古典生态智慧可以提供克服现代病的现存灵丹妙药的看法也无益于事。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话沟通,促成人类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创建一个较为美好的未来。中国当代哲学家张岱年“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文化”,“主动吸取外来文化的成果,取精用宏,使民族文化更加壮大”的主张,是可取的方略。

曾经创造过昔日辉煌的东亚智慧,将在现代文明大潮中,与西方智慧相与切磋,彼此为对方提供补强剂、复壮剂,达到互动共进,以创建多元一体的人类新文明。

为了明天更加明媚的阳光和灿烂的星空,为了人与人既合理竞争又相亲相爱,为了每个人身心得到健全平衡发展,让我们上下一心,现在就开始行动!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先秦政治思想史[A]. 饮冰室合集(第9册)[C]. 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卡普拉. 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M].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 周振新)